

# 父亲石声汉的 1944 年

石定祜

《浣溪沙·嘉州自作日起居注》

甲申夏末 六首

五鼓敲残露薄曦，匆匆推枕起  
寻衣，渐闻啼鸟弄晴晖。汲罢井华  
僵指活，烧明冷灶倦眸眵，昔门吹  
角报升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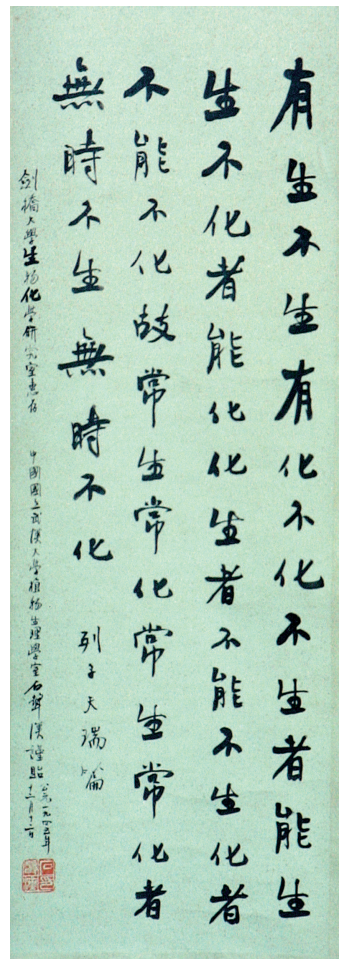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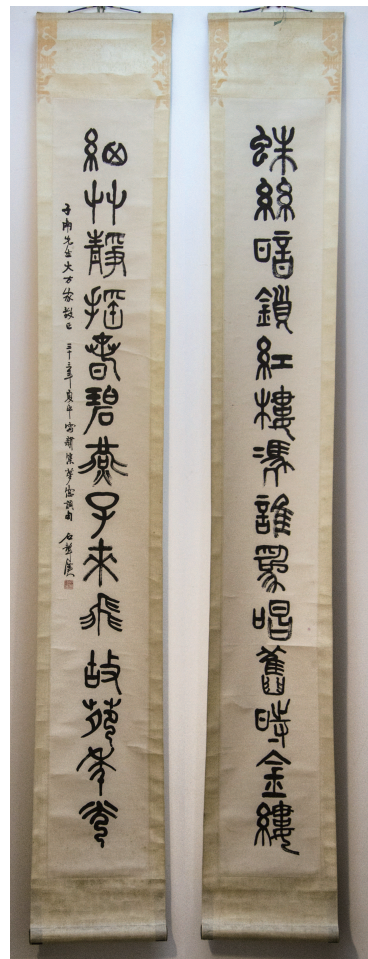
白足提篮上菜场，残瓜晚豆费  
周章，信知蕪笋最清肠。幼女迎门  
饥索饼，病妻扬米倦凭筐，邻厨风  
送肉羹香。

十号才能几日过，频频挂历待  
如何，纵教发放也无多。寄卖行前  
低问询，旧书摊畔再逡巡，近来交  
易有成么？

双袖龙钟上讲台，宽履肩阔领  
如崖，旧时原是趁身裁。重缀白嫩  
蓝线袜，去年新补旧皮鞋，烫它终  
日口常开。

课罢归来喘未纾，糍糍蹒跚扫  
庭除，添薪落叶也都疏。脱粟饭成  
儿女乐，涤盘水竭病妻疲，一灯先  
课大儿书。

骤雨惊传屋下寒，短檠静向伞  
边燃，明朝讲稿待重编。素静自闻  
肠辘轳，风摇时见影悬悬，半只烧  
剩什加烟。



这六首词是 1944 年夏末，父亲在四川嘉定（即乐山）写下的。它真实地描述了抗日战争的苦难岁月中我们家贫病加的困境。当时大哥定机 11 岁，大姐定杜 7 岁，我 5 岁，定朴 3 岁，定恒不到周岁。父亲虽是武汉大学教授，但薪金微薄，“纵教发放也无多”。微薄的新金要赡养奶奶，接济三个叔叔读书，还要养活自己的七口之家，生活的困窘可想而知。他虽力多兼职，除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任特约研究员外，还兼任中央技专专科学校教授、全华化学工业公司技术顾问，却仍入不敷出。为节省开支，家里总买最便宜的糙米，糠粳和稗子很多，做饭前需用簸箕使劲地簸扬，使糠粳、稗子、沙石等分离出来，捡干净后煮出的饭才能吃。繁重的家务和严重缺乏营养，令母亲的身体一直很虚弱。“病妻扬米倦凭筐”，饱含着父亲的自责和对母亲的痛惜。定恒 1943 年去世后，父亲还硬是每餐少吃一碗饭，“室静自闻肠辘轳”就成了常态，可这又能省出多少钱呢？

为生活所迫，在昆明同济大学和乐山武汉大学当教授时，父亲都曾尝试卖出自己的书法作品以贴补家用。那时年幼的我，对父亲卖出过多少，卖给了什么人，不可能了解。1995 年我退休后，四处搜集父亲写传记的素材时，也曾希望能意外地发现他当年卖出的书法作品，均一无所获。

在那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了解他并欣赏他书法的大多是大学教师，而他们生活十分困窘，对父亲也爱莫能助。而另一方面以父亲做人的原则，也不肯将自己的书法随便卖给己不了解的人。大哥跟我讲过：一次，有人买来父亲写的一副对联，想请父亲为对联题款。父亲觉得自己不认识他，不知此人的为人和底细，婉拒题款后将对联收回，把钱退还对方。

父亲尽管十分清贫，却始终洁身自爱，绝不趋炎附势。武大在乐山时，当地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十二补充兵训练处，算是中央驻军。处长韩文源不过是一个师长，但因为是中央军在乐山的最高长官，飞扬跋扈，不少地方官绅都讨好巴结他，就连武汉大学的一些“学人”也以结识他为荣。父亲十分鄙薄这些人和事，羞于为伍。韩为当了装门面，拟在武汉大学特聘 20 位教授当顾问，每月发给津贴若干，我父亲也在名单中。父亲断然拒绝。韩听说父亲篆刻的印章从设计到刀法均颇有功力，让人转告为他篆刻几枚名章，父亲坚拒。对方让人传话威逼，父亲拍案而起，将刻刀扔进字纸篓，誓言今后绝不再作篆刻之事。

令人惊喜的是，父亲去世近五十年后，我却意外地见到了父亲 1944 年卖出一副集吴梦窗词句篆字对联（图左）：

蛛丝暗锁红楼，凭谁为唱旧时金缕；  
细草静摇春碧，燕子来飞故苑春光。

上联“蛛丝暗锁红楼”句集自吴文英《荔枝香近·七夕》，“凭谁为唱旧时金缕”句集自《绛都春·余往清华池馆六年赋咏屡矣感伤今益不堪怀乃复作此解》；下联“细草静摇春碧”句集自《瑞鹤仙·钱郎归晋之岩陵》，“燕子来飞故苑春光”集自《应天长·夷则吴门元夕》。这副对联的篆字灵动而秀丽，题款为“子南先生大方家教正 三十三年夏中写新集梦窗词句”。

然而，这位子南先生究竟何许人，我却毫无线索。当时的武大没有名叫“子南”的教授；对联原来的持有者只能说这是爷爷李扶忠留下的。有位“子楠”，是李爷爷的朋友，他们都是贵州人。不过，另有四幅条屏，题款为“甲申秋·子楠十二兄周先生正

宜甫弟周询 时年七十四”。周询字宜甫，贵州麻阳县人，前清举人，民国时著名金融家、实业家、书法家，曾先后任中国银行成都分行及重庆分行经理，巴蜀中学校董。“甲申秋”即 1944 年秋，与我父亲写的篆字对联几乎同时。从题款看，子楠与周询关系密切，是姻亲。

“子南”“子楠”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又是什么身份？侄儿克析考虑到，1944 年爷爷正在范旭东先生创办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兼职，如顺着这条线索跟踪，也许能有所发现。果然，他在《董浩云与中国远洋航运》一书中查到：董浩云 1929 年入职新成立的天津航业公司，当时范旭东是这家公司的监事，另一名监事正是杨子楠。在《船王董浩云在天津》一书中，也有杨子楠参与盐运合同谈判、签订等事宜的记载，则“子南”“子楠”即应是杨子楠，他与范旭东先生在事业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范旭东生于 1883 年，年长父亲二十余岁，是父亲的前辈。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在天津兴办实业。为了和当时独占中国硫酸铵市场的英国卜内门所支持的科研机构抗争，更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范先生 1922 年出资 10 余万元银元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化学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转移到四川开办自贡久大自流井盐厂，在犍为县五通桥（今属乐山市）范先生在此建厂后命名为新塘沽）开办永利川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也迁至五通桥。父亲抗战初期在迁至昆明的同济大学生物系任教，1941 年 9 月追随恩师张珽（字镜澄）教授去武汉大学生物系任教，也来到四川乐山。1943 年春，范先生随父亲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做特约研究员，做植物营养方面的研究并培养科研人才。1945 年 10 月 4 日，范旭东先生积劳成疾，在重庆病逝。父亲与范先生相识、相知仅两年多，但他的人生却因此发出了更夺目的光彩。

在《生命新观》序言中，父亲写道：三十二年（1943 年）五月，在新塘沽第一次见到范旭东先生。范先生觉得应当有一本中文书，写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生物学的人生观”来，而且提示我应当尽这一点责任。范先生的话，上半我绝对赞成：这本书的确需要。下半，我无从反对：这本书现在却并没有。有一句自谦之词，道是“抛砖引玉”；目前真正的生物学者，既然还没有拿出玉来，像我这样一个从事生物科学的人，走出来抛一两块砖头，既无损于学术的尊严，也无身份受伤之虞，正是“义不容辞”。所困难的，我虽在从事生物科学，寻常也尽有着一些偏见，但自己尚无一点够得上称为“人生观”的见识，因此，总想抛砖，也苦于无砖在手。结果回答范先生：“回学校去努力尝试，不敢说定能成否否？”……

父亲深思熟虑后，确定了该书的主题：“生命是根据什么，利用现在，创造未来，是连续和渐变的变化。”他从一个生物学家的视角引导人们认识大千世界中各种生命现象，把人生看作生命一角。他反复告诫人们：人类在利用大自然、向大自然索取时必须敬畏大自然，与环境和谐相处才能使生命连续不断地发展。《生命新观》1944 年 6 月至 1945 年 5 月陆续在黄海化学工业社的企业内部刊物《海王》发表；1944 年 11 月武汉大学文化印书馆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62 年 12 月台北世界书局重新出版；2019 年 7 月台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又以《石

声逸书两种》为书名，将《生命新观》与父亲 1928 年在中山大学写的《国立中山大学广西大瑶山采集日程》合集出版。

当年董作宾先生读后，用甲骨文书写了一副对联赠父亲：“生命别自有新观，惟多识虫鱼鸟兽草木；文笔足以传旧事，乃纵言中外上下古今。”他去台湾后曾以《生物学家的人生观》为题撰文推荐这部书：“我是一个专门研究人文学考古学中甲骨学的人，看到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者，能用中国文字写出这种伟大的著作来，而且先生的国学功底深厚，能以浅近的语言，说明生物科学的专门学问，很是难得。……在一个自然科学常识缺乏的我，真是视同瑰宝，一直深深地藏在行篋，舍不得遗失。”

在《生命新观》中，父亲引用了《列子·天瑞篇》中的一段话阐述自己的生命观。1945 年父亲特地选了上好的宣纸，将这段话抄录成条幅，装裱后与《生命新观》一起寄给朋友李国剑、李约瑟一起寄给友人李约瑟。李约瑟一直将它悬挂在自己的办公室，书则放置在身后的书架上。他逝世后，李约瑟研究会将条幅带到台湾重新装裱，作为研究所保存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生命新观》也珍藏馆内。

1945 年 12 月 20 日的《海王》杂志刊登了我父亲撰写的《悼范旭东先生》。文中除盛赞范先生振兴民族工业的丰功伟绩外，更追述了范旭东先生对自己的关爱、教育和激励。他深情地写道：

余生也晚，早岁糊口四方，徒耳先生之名，未得一亲馨款。泊三十二年春末，终幸获于新塘沽谒见；数语之下，即以写生物学人生观为嘱，戒毋摘他词，自安于绮语遁世。后此数四拜聆提命，恒以蒲柳衰飒为念，必令餐好自珍。慨见道过迟过浅，比得棒一鸣言，顿悟天人大大德。积慕操觚，为《生命新观》三篇救命。去冬杀青，先生适以国事旅居海外，未遑悉承指海。今夏传语准准，感奖甚多。方期国士相如，当以国士见报，不意人事流播，遂伤永诀。闻耗彷徨，不徒私衷哀悼；为国家民族学术着想，亦皆悲不可胜。……

父亲对范旭东先生有如此真挚深厚的感情，如果与范先生共事的杨子楠在范先生处见到父亲的书法，并托他向父亲索要书法作品，范先生定会欣然转告，父亲也定会慨然应允。从当时情况和已有线索分析，这副对联应是父亲卖给杨子楠的，而不是送给他的。仔细研究一下对联题款，“子南先生大方家教正”，写得十分客气，说明父亲与“子南”的关系实际上很生疏。湘潭石氏家族的祖训是“读书上进”，家规只容许子弟选择“耕、读、幕”三种职业，不许经商。因此，父亲一生都不愿与商人交往。但对范先生所托之事，他尽心尽力去完成，且不会怀疑求学之人的人品。范旭东先生对我父亲当时生活的困境是非常了解的，并且真诚地关心他，设法帮助他。想来范先生会向杨子楠先生讲述我们家生活的困窘，杨子楠就用付润格的方式取走了对联。这样的推理应该合情合理，我也得以了却找到父亲当年卖出的书法作品的心愿。

回望 1944 年三十七岁的父亲写下的一组词、一副对联和一本书，让我见证了父亲在忧患和苦难中不颓丧、不潦倒的精神样貌，再次感受到他“科学救国”的信念，体味他“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的誓言。

《玉台新咏》与《文选》是成书于南朝的两部重要的文学总集。《文选》诗文并收，《玉台新咏》则专收诗歌，且是女性主题的诗歌，体现了萧纲与萧统迥异的文学观。

“研究中国最早最佳的艳体诗集这样听起来很浪漫色彩的事，被他用苦行僧的做法做得毫无浪漫色彩。”曾有同行这么评说傅刚教授的《玉台新咏》研究。这是因为，傅刚主张研究集部文献和与之相关的文学史问题，都需要先做文献版本研究；往往“清理出了版本的问题，问题的线索甚至答案，就直接出来了”。近日，《文汇学人》特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蔡丹君访问傅刚教授，请他谈谈十多年磨一剑的《〈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18），及他对集部文献研究的想法与期待。

## 先清理版本，再开展研究

您为何会选择《玉台新咏》作为研究对象？您开始研究时，国内外学界对这部诗集的研究情况如何？

傅刚：当时选择研究《玉台新咏》是很偶然的。最初是对它的编纂者，继而又对它的编纂体例感兴趣。2000 年开始，我真正关注和接触《玉台新咏》以后，才发现它的问题非常多，版本问题就不少，索性就想都搞清楚。

《玉台新咏》长期以来背负艳体诗集的名声。直到 1980 年以后，南北朝文学研究打开了新局面，对它的看法才开始客观起来。有三位学者的研究颇有代表性，他们分别解决了不少问题。日本的兴膳宏教授确定了《玉台新咏》编纂的时间、体例等问题。沈玉成教授的结论与兴膳宏一致，也认为《玉台新咏》编纂于中大通六年（534）。刘跃进教授最早发现兴膳宏工作中存在版本问题，他认为赵氏本不可信，明通行本可信，因此，最后确定《玉台新咏》是徐陵所编。

我自己通过对《玉台新咏》版本的调查，认为赵氏覆宋本是最合于原貌的版本。当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编纂目的讨论《玉台新咏》编于梁时可信，一是从体例上论证赵氏本合于徐陵原貌。我对前六卷诗人卒年可考者逐一考订，证实是合于卒年先后的顺序，又对七至八卷当时现存诗人卒年考订，证明不是按生卒年，而是按照官爵高低顺序排列，从而证明赵氏本的可信，而明代通行本却不能验证它的体例。

您的《玉台新咏》研究工作开展了十多年，这种情况在学界常见吗？

傅刚：是啊，十多年一晃而过。其间常有人问起我最近在做什么，我的回答总是——在研究《玉台新咏》。对方就非常惊讶，不解为何一部小小的诗集要研究这么久。但是回望过去，我也并没有浪费时间。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步调，来亲手做我自己的事情。

这项工作，粗略地划分，大概就是三个阶段。我向来的经验是先清理版本，再开展研究。第一个阶段，针对编辑体例问题，查看了很多《玉台新咏》版本。第二阶段开始探讨有关《玉台新咏》与宫体诗的一系列文学现象，考察关于宫体诗的性质、南朝艳情文学发展的社会条件、《玉台新咏》和《文选》的比较、萧父子与梁代文学的发生等等。南朝好些文人比如萧衍，是由武转文，他们自己是武功起家，他们的子弟都转入对文学的追求，这些现象很有意思。第三阶段则集中、全面涉及版本问题。最初先做的版本叙录。调查版本的时候，跃进写过的，就做个补录。他没有写到的，我就补充一些内容。同时也做了相对繁复的校笺工作。

《玉台新咏》的版本复杂吗？

傅刚：说复杂当然是复杂，因为版本很多。但说简单也简单，它的版本系统主要有两个，一是宋陈玉父系统，包括赵氏覆宋本、五云溪馆铜活字本、孟璪刻本，一是明通行本系统，包括徐学谟本、郑玄抚本、张世

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学系的保罗·马斯格雷夫近日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发文反对学术书评，他认为这些通常带有功利目的的衍生品消耗了期刊大大容量。他以自家领域的期刊《政治观点》为例，最近一期就发表了 80 多篇书评。其所要求的学术关注、占用的资源、消耗精力，值得人们发问，这些书评是否真的有意义。

马斯格雷夫批评的对象是 500—1000 字的标准学术书评，他认为这些公式化的小文章简直太入眼大好预测了。这些书评与评论文章不同，评论文章可以长达数千字，涵盖一本、两本或多本书；或单单聚焦一本书，请多位作者一同评论。它不同于像《纽约书评》上那些写给广大读者的书评。

老式的学术书评，对一本书的论点提供概述，有益于补习的研究生，也有助于研究人员决定下一步参考什么文本。不过，马斯格雷夫觉得：“如果我们用书评作为评价工具，那么就是在用乌比冈湖的标准，照这个标准，每一位学者都是杰出的，每一本书都高于平均水平。”社会

# 需要回到学术史中去，开展集部文献的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特聘教授傅刚



文汇报学人 第 449 期

这两个系统最大的区别是梁武帝父子作品所在卷第不同，以及萧纲、萧绎的署名问题。前者将萧氏父子作品放在第七卷，署萧纲为皇太子，萧绎为湘东王；后者将萧氏父子作品放在第五卷，署萧纲为简文帝，萧绎为梁元帝。二者所收的诗的数量，差距接近 200 首。前者收了 660 首诗，后者则是 849 首。那么，总有一个是被人改动过的。我经过细查发现，明通行本改动的可能性更大，赵氏覆宋本体例则是在《玉台新咏》中得到验证的。

## 要历史地去理解和看待清代学者

您重新笺注《玉台新咏》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底本？

傅刚：我没有用学术界通常使用的文学古籍刊行影印本，因为那个本子赵氏覆宋本中错误最多的。赵氏覆宋本前后有三次印本，第一次印本即中华再造善本所用的底本，其本印行后不久，赵均又作了一些修改，印了第二次，这是赵氏覆宋本中最好的。文学古籍刊行影印本的底本是第三次印本，因为刷印时版片已经淤裂，字迹漫漶，刻工字迹迹模糊，所以讹谬甚多。对比下来，我选用了第二次印本。这个印本存世也不多，2018 年我与中华书局合作，将它与翁氏藏冯班抄陈玉父本一起合印，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校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傅刚：我之所以作这个校笺，是因为在研究中发现清初诸家如二冯、吴光宜、纪昀使用文献时往往不标出处，或标出处也与我们所见文献不同。如清人所用《艺文类聚》与我们现在所用的宋本在文字上往往不同，这是因为他们使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善的。还有一些文献，他们能够见到，但现在已经失传。这些情况应该对读者说明，所以有必要作校笺。

其次，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清初学者对文献的考订和研究的结论，其实前后有承继关系，后来的人往往使用前人的成果或文献资料，却没有一一说明，我觉得也应该作校笺，这也是《玉台新

咏》研究史中应该清理的问题。这样，清初各家在考校上的价值所在，就很清楚了。所以我的校笺主要就前人已有的字词考订作清理，许多前人没有考订的异文等，我就没有作校笺。

《玉台新咏》的诸种校勘中，何以清代学者纪昀的工作超越于众人之上？

傅刚：赵氏覆宋本出现后，经过二冯的考校，引起了士林的轰动。此前学术界多用的明通行本，这之后大家都认为赵氏覆宋本最合徐陵原貌，因此基本上都相信赵氏本了。比如吴兆宜本来用明通行本作注，但赵氏本出来后，就改用赵氏本了。纪昀比二冯和吴兆宜都晚，但他的《玉台新咏考异》（《四库全书》收入，署的是他父亲纪容舒的名）却是集大成成果。《玉台新咏》研究中的许多命题在清初学者研究中都提出，而且也都给出了很客观也很具说服力的解释。此外，纪昀是清初重要的学术领袖，他仿朱熹的《韩集考异》作《玉台新咏考异》，从集部入手，考订先唐文献，而带动一代学术风气，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

开展集部文献的研究，需要回到学术史中去，要做一些对前人研究的考量。这个时候一定要历史地去理解和看待这些学者。他们用到的参考书，像纪昀用的唐人、宋人的类书、总集等，和我们如今看到的本子不合。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明本，而我们看的基本上是宋本。现在只能根据宋本，和能找到的明本来对应看看。所以，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果能清理一下，会发现其中很多内容存在一些辩证关系，从中也能看出清代人在考校的时候，他们的学术平台是什么。

## 文学、文献不能分家

您常说，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从事文献研究，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这句话具体该怎么理解？

傅刚：每一种文献都是独特的，面对它们的时候，要弄清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文献整理还是为了研究文学史的问题。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和做纯文献研究是很不一样的。

《玉台新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诗歌风貌，这部文献很有特点，它的文献能否清理好，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影响我们在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的结论。比如，兴膳宏教授的结论本来是对的，但他不做版本，就会有人提出疑问。所以，《玉台新咏》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是中国古代学术文献和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范例。我所说的文学、文献不能分家就是这个意思，也是针对当前大学中文系将文学与文献分为两个专业说的。

现在电子影印文献很发达，您如何看待不出书者就能从事文献研究的趋势？

傅刚：现在研究文献，很多时候都是利用电子文献在做，省时省力。我还是主张要亲见其书。因为影印的时候，书籍上的很多信息会消失，还有一些拼接的东西，更是难辨它的来源。古代文学学者做文献整理，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态度也不一样。当代的文献工作和老一代学者的工作之间，有很多不同。总有人说当代的学术不如前人，但就古籍整理而言，我认为超过前人的。当然，目前也有股一拥而上的趋势，人人都来整理古籍，而没有文献工作经验和基本知识的人也张口就谈文献整理。还有的人找一众学生帮忙，看着一大堆成果，其实精粗不一，甚至错误很多，难以利用。我还是主张学术研究是个人的事，同样，古籍整理也是一个人的事。

您对学术界目前的集部文献研究有什么特别期待吗？

傅刚：我曾想找当代对集部文献有研究和体会的学者，开一个集部文献方法的讨论会。大家就自己的个案研究，总结整理方法和经验，并建立一些学术规则。因为当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与古时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前人没有碰到的问题，总结这些处理方法，相信对目前的工作会有帮助。

## 论衡

# 书评不是推荐信

编译 / 黎文

心理学中的乌比冈湖（Lake Wobegon）是美国一档广播节目里虚构的小镇）效应，意指高估自己的实际水平。放眼望去，每一本被评论的书都是“开创性的”“细致的”“原创的”“值得认真对待”。人们发现评论者的委婉语不断升级，以最友好的方式表示不同意，或是提到他们认为作者过分强调或低估了某些条件，或是暗示他们的结论有某些限制。

其实，学者只要下定了决心，就能展现出和文学批评家一样的犀利，把斗牛提升到传奇的地位。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书评都是爆发“谩骂”天赋的那类，但它们终究还是稀疏如无限虚空的大空中闪烁的星星。书评已经像推荐信一样，不断降格，吹捧泛滥。

单调乏味的好评会不断滋长读者的愤世嫉俗。当然，书评何以平淡、正面的一个原因是主流学术大社的书在出版之前即已受过同行评议，对质量有严控。但还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名利主义——为什么要公开攻击那些可能会进入你下一个招聘委员会的人，或者那些会对你下次会议上的论文提出刁钻问题的人？

马斯格雷夫也道出其中的人之常情：“书评人和期刊论文评审的群体有很多重叠，除非杂志编辑一直在密谋反对我，否则同行评议不会对我特别客气或特别理解何。”他理解书评何以温和，同行评议何以严厉：“同行评议是匿名的，而书评则不是。同行评议决定出版什么书，而书评不决定。”

马斯格雷夫呼吁更具批判性，同时也更快速的书评，因为如果拖延时间过长，可能会影响高校图书馆对图书的选择。他推荐《新漫步者》（The New Rambler）和《H-Net》这两份在线杂志。它们发布及时、严肃、长篇的历史和相关主题的新书评论，无需付费，让书评能够更快成为学术对话的一部分。